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11月22日，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过去10年，因健康原因，陈映真一直在北京接受治疗。

陈映真原名陈永善，台北莺歌人，1937年10月6日出生于台湾。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外文系。陈映真的代表作有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上班族的一日》《苹果树》《铃铛花》《忠孝公园》等，他还曾著有《中国文学史论》。他的作品受鲁迅影响颇深，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为主，色调忧郁苦闷。他曾自言，“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这在当时的台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1949年败退台湾后，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1968年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陈映真十年有期徒刑。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作者、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曾在中国社科院做过演讲，他说，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陈映真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陈映真要把所写的文字，绕很多弯，涂很多层，像古典油画一样，一种精神会暖暖地穿透层层形式透露出来，“形式是盖不住的，反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美感”。

大陆读者了解陈映真，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无法被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所打动，但陈映真与白先勇一样，笔端带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即古典文学的韵味。

当大陆作家匆匆地用故事和所谓“生动的细节”填满文本时，陈映真的写作却显得极悠闲，细节常常没有特别的目的性，仅仅是为了一种叙事的“干净”。比如，陈映真写对话，并不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或“塑造人物性格”，更不是“为作者代言”，纯粹是为了烘托一种杂语式氛围，那种复调充满趣味，反复读来，发现竟无从模仿。

1989年与1990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此后，陈映真频繁往来大陆，跟他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也或多或少都对他有些抵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陈映真的问题经常让大陆作家感到不知所措，他在会上发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

也就在陈映真频繁往来大陆的时候，他却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被“遗忘”，被社会甩在了后面，赵刚说，“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走在我们前面，他思考过很多我们思考的问题，他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和他缺少一种联系意识”。

最能理解陈映真的大陆作家，居然是隔代的王安忆。陈映真对于王安忆，是“精神偶像”一般的存在，“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自1983年初见，“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而陈映真对王安忆也十分欣赏，“在爱荷华相处三个月，我才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她那发乎自然的不把一切的荣光揽在自己身上的心灵的美。”

陈映真的文学曾被评价为格局“小”，写得太琐碎。在他去世后，有学者认为，如今缺少一次对陈映真的再发现。其实，如果从“我”出发，就会发现陈映真境界并不“太小”，他的作品充斥着理想主义，他写的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充满道德勇气，他们自觉地在内心拷问自己，因此常有惊人之举，是真正的人的文学，陈映真的写作被忽略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领先于时代。“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这是陈映真曾写下的话。



陈映真，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早年作品多描写一代人的精神苦闷

在大陆读者最早接触的台湾严肃文学中，就有陈映真的小说：《面摊》《我的弟弟康雄》《苹果树》，还有《山路》《将军族》……彼时，似乎有人将其归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其实，陈映真几乎每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其中有些生活于乡间罢了。

读他早年的作品，那些描写一代人之精神苦闷的小说，似乎总可以闻到那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而初涉文坛，陈映真更直接的模仿对象，无疑是鲁迅。相较于鲁迅小说中那些略显概念化的描述和人物塑造，陈映真的语言、他向自己心灵深处的探寻和挖掘都更为细致。擅长描写人物内心传统的同时，他也为表达这类人物的心灵世界，找到了更显诗意、更细腻灵活、更契合时代的语言，这也算是他对当代汉语文学的一大贡献吧。

比如《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就是以一种哀歌式的独白形式来展现的。尽管在它之下，流淌着的是一股永难解开的忧郁情结，和与时代相称的颓废无奈情绪，但读来却能让人感受到它缠绵不断流淌着的诗的韵致。作者很可能想借这篇小说，来对自己的少年时代作一告别：“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

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不能赦免自己的罪。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其、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

这种不安，其实是他那一代，乃至普世每一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有的，但他没有停留在这种青春期的伤感中，而是力图借助文学创作，冲破这层人世间的迷雾。于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他，很快就从《圣经》中找到了灵感。他把犹太出卖耶稣的故事重新叙述了一遍，写出了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来自加略这个贫困、愚昧之地的犹太，乃是一个有着“为了左右穷困者被压迫者”而奋斗的理想主义青年，他反对犹太人上层替代罗马人上层的所谓“革命”，而他之所以出卖耶稣，是为了要引出“革命群众”，激起他们对罗马统治者的愤怒。

但这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冲破罗网”之举好像仍无法满足陈映真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憧憬。他后来在《后街》中自述：“他从梦想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连同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中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吸在画布上挥动画笔，有时甚而迷惑了自己。”

写悲剧小说却不怀疑信仰

转变出现在一九七五年，那一年他在文坛复出。在《贺大哥》、《上班族一日》、“华盛顿大楼系列”等作品中，他的写作手法变得写实，早期的幻灭与绝望的主题逐渐淡出，小说开始着重关注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对“人之心灵的损耗”，他亦始终抱持一种信念，那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遭淘汰。所以之后不久，他又开始在小说中重温“左派”旧梦，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山路》。但这部侧面描写革命者生活历程的小说，最后的结局却仍是一如既往的悲剧：故事结尾，因为同情革命者而自愿嫁到李家，承受了一生劳苦的蔡千惠，每天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标志物”，房子、汽车、地毯、暖气、沙发、电视机、音响，不由地开始怀疑过去执着的信念，进而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终于在萎靡衰竭中死去了。

尽管为小说设定了这样的结局，但陈映真自己并不真的怀疑坚持信念的意义，正如他在《贺大哥》

中借任务之口说出的那番心里话：“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实现，是千百世以后的事，你从哪里去汲取生活的力量啊？”“不，毋宁是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及身而见到那美丽的世界，你才能开始把自己当作有史以来人类孜孜矻矻地为了一个更好、更平等、更自由的世界而坚毅不拔地奋斗着的潮流里的一滴水珠，看清楚这一点，你才没有了个人的寂寞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并且也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爱的、信任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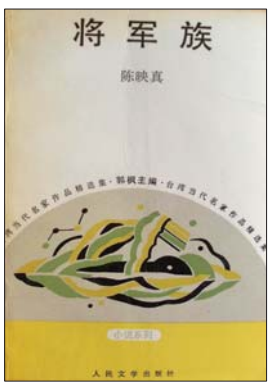
这就是“老灵魂”陈映真，一个如今看起来那么过时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文字却依然能让人无比动容。不过，尽管他早已自我警惕道：“革命者和颓废者、圣徒和败德者，原是那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晚年却还是没能抵制住世俗的种种诱惑，真不知该让人如何言说。（本报综合《新京报》、《新快报》等）



《陈映真文选》 陈映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忠孝公园》 陈映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将军族》 陈映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 设计：壹纸工作室
- 本版编辑：曲鹏
- 美编：马晓迪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去世——永远以弱者的立场凝视人、生活和劳动